



从萨帕提斯塔运动看边缘人的媒体策略

刘学蔚

摘要: 现代传播技术既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也成为了边缘群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墨西哥的萨帕提斯塔运动及该运动的代言人副司令马科斯的媒体策略都体现在这一点上。

关键词: 萨帕提斯塔运动; 边缘文化; 媒体策略

一、全球化时代的边缘文化危机

自人类文明形成之日,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便随即发生,由于社会、历史、宗教、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异质文化相遇后往往难于以一种互惠的形式交融。隔阂就这样产生了,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很多隔阂逐渐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如今的跨文化传播,通常体现为强势文化主体凭借其政治经济力量对弱势文化群体所采取的血腥攻势,以及蔑视或诋毁后者的文化价值的野蛮之举。文化主体的地位愈不平等,异质文化相遇所带来的冲突就会愈加猛烈。边缘文化群体一向缺乏主流媒体的关注,更缺乏一个具有活力的市民社会的监督和声援,即使偶尔也会有一些标新立异的声音迸出火花,但更多的低位文化群体则逐渐远离了社会的话语体系。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文化的伦理建构被不断地提上议事日程,人类对掌握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法则的需求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迫切。

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个以平等、和平、公正、具有充分包容性的话语交流为导向的全球公共对话领域,实现这一宏远目标需要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采取自我保护和主动进攻的策略,以改变或抑制信息单向流动的传播旧秩序。于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群体对文化自治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是那些沦落为边缘的具有确定形式的文化群体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他们想要获得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立,而仅仅是作为文化公民应该拥有的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尊严。随着互联网和通讯卫星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越来越密切,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已经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最主要手段,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和应用价值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经济、政治、文化水平的巨大不平等与全球化的迅猛进程,却空前地影响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伦理立场。如何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在保持生命力和活力的同时,也能以开放的姿态与他种文化进行有效的交流,如何使文化个体在保持个性和生命力的同时又不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姿态、宽容的心理和发展的眼光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一直都是跨文化传播学在文化伦理层面上研究的核心问题。当今学术界并不缺乏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思考,但现实生活中成功案例的缺乏使其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传播法则。我们迫切

需要一些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成功例子作为边缘文化群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有效抵抗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榜样和楷模,让理论家和实践者探索出一种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更加符合文化伦理准则的互惠方式。

就在现代信息社会迅速发展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有一个带着神秘光环的小人物以一个“革命道德者”的优雅姿态为困境中的边缘人群点燃了希望之火,他不仅是萨帕提斯塔运动不可或缺的领袖,也是全世界边缘群体的杰出代言人,结合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所有特点,用极其后现代的方式领导着这个奇观式的运动。他的媒体战略让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不仅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了恰帕斯这块弹丸之地,更是让革命的圣火蔓延到地球上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文字是他们无坚不摧的战斗武器,网络是他们无所不能的传播空间,副司令用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夺取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让这场运动以其最有魅力及最高效的方式进行和持续发展着,他不仅引领了一场地区性的土地革命,更是发起了一场国际化的道德革新。

二、萨帕提斯塔运动的媒体策略

全球化时代的媒介将对边缘人群争取社会、文化认同及其相应的权利起到重要作用,而媒介舞台也将逐渐变为边缘人群传播文化、反抗主流社会的控制与压迫的主要战场。这是全球化进程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给边缘人群带来的契机,而人们对媒介伦理越来越多的反思也推动了这一新型的斗争方式。墨西哥的萨帕提斯塔解放军(Zapatista)选择在1994年1月1号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生效之日爆发起义,并以武装和蒙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制造景观,吸引媒介的注意,并通过媒介和公众舆论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印第安原住民并没有计划和政府进行真枪实弹的殊死搏杀,而是在起义爆发后的第十二天就完成了整体迁徙,他们开始在自然环境极其险恶的拉坎顿丛林深处躲避政府的追击并开始建立新的原住民社区进行自治管理,从那时起,萨帕提斯塔运动代言人副司令马科斯真正开始施展他的媒介战略,将现实中的战场完完全全地转移到了媒体战场上。“我们的词语是我们的武器!”这是萨帕提斯塔运动最为著名而响亮的口号之一,也是这个用词语完全代替了子弹的革命最为引人瞩目的地方。在革命全面展开的时期,马科斯的文章主要以公告、寓言和书信体的形式定期刊登在墨西哥国内的媒体上,并通过互联网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在接受诺贝尔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时,马科斯说道:“当你意识到你竭尽全力去表达特定事物却遭遇了失败,这会迫使你琢磨语言的技巧,去反复推敲它们,将它们武装起来或者解除武装。”^①于是,这场土地革命变成了词语的革命、媒介的革命、伦理的革命。在这与世隔绝的深沟险壑中,他们不仅没有被政府一举歼灭,反倒是成功地与政府将近1/3的军队力量周旋至今,并持续地获得来自国内和国际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与援助。

他们的声音“因武装而获得倾听”,他们的面庞“因隐匿而获得注视”,他们的称谓“因匿名而获得命名”^②。对萨帕提斯塔解放军来说,面具是他们吸引媒介关注的一个重要“伎俩”,在这场运动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副司令用面具和“道具武器”让即将遭受文明灭绝的印第安原住民闯入主流社会的视线,亦向全世界的边缘人群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戴上你的面具,你就是我们,你就是萨帕提斯塔。何塞·克里纳曾说萨帕提斯塔的“面具即讯息,讯息即景观”^③。外界对这种符号的注意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对运动本身的关注,这是一种充满认同感的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其代表的不同寻常的革命方式之外,更是因为马科斯非常高明地通过面具将这场后现代革命与拉美洲玛雅文明的历史与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当政府军队打着搜寻游击队员的借口在恰帕斯原住民社区横行无忌的时候,原住民百姓们为了保护他们的萨帕提斯塔战士而蒙住了自己的面庞;2001年3月,在起义军25

① José de la Colina. “As Time Goes By—‘Marcos,’ or The Mask is the Message,” *The Zapatista Reader*. Edited by Tom Hayden.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Nation Books, 2002, p. 187.

②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2002. *Our Word is Our Weapon—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Juana Ponce de Le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pp. 101~102.

③ Márquez, Gabriel García, Cambio. “Marcos Speaks,” *The Zapatista Reader*. Edited by Tom Hayden.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Nation Books, 2002, pp. 101~102.

名领袖著名的长征路上,从世界各地赶往墨西哥的该运动的拥趸为了保护和他们的反叛偶像而蒙上了自己的脸庞;在欧洲、美洲大大小小的摇滚演出上,亦有太多的乐队用蒙面的方式向萨帕提斯塔解放军表达支持与敬意。在以木枪武装起来的“真人秀”式的战斗里,在对自然力量的敬重远甚于政党统治的印第安人群中,在副司令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枪实弹的武力革命只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武力统治)和阿尔都塞的符号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消融在言语世界和符号系统里)的领悟中,面具似乎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比高明的策略。稍加甄别就能发现,这业已达成其强大象征力的面具(更准确的说法是滑雪帽)并非专属马科斯所有——尽管他无法阻止自己早已由一个“代言人”变成了精神领袖和另类偶像——在这位自始至终以“代言人”自诩的副司令所引领下的恰帕斯印第安原住民和萨帕提斯塔运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都自发地将自己掩藏在了面具之下。

萨帕提斯塔解放军在恰帕斯地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电台,这两种传统的地区媒介传播手段在恰帕斯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起义军组织内部及原住民社区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还方便了外来记者与探访者即时了解运动现状及其发展。不过,传统小众媒体受地域和社会的双重局限性很大,操作起来更为复杂,所以马科斯将主战场放在了更为主动、更为自由、潜力更大、空间更广的互联网上。萨帕塔解放军发布官方消息的网站主要有两个:萨帕塔解放军官方网站和恰帕斯独立媒体中心。除此之外,随着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网络策略的全面展开,遍及世界各地的草根组织和群体也对该运动给予了强烈的支持与回应。距不完全统计,在运动开展的十几年时间里,与之相关的大小网站多达上万个;其中规模较大的网络组织有20个,其中的15个至今还活跃在互联网上,有13个组织建立了网络资料库,这些网络组织主要以发布新闻和运动最新动态为主,并与其他大小网站互相链接,保持着紧密联系;另外,颇具影响力的其它网站还有60个,其中的55个仍然处于活跃状态。在这些由民间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自发创办的网站中,内容最全、影响最大的要数1994年秋天成立的恰帕斯95(Chiapas95),其创办者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副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哈里·克利夫(Harry Cleaver)。在起义爆发之初,克利夫就对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当时互联网上有关萨帕提斯塔起义的新闻与评论都比较杂乱和分散,所以克利夫全面、系统、集中地为该运动建立了一个网络资料库,并收录了有关该运动的一些学术论文。成立于2000年的KIPTIK是最为活跃的一个英国支持者组织,在网站上不仅有全面且即时更新的信息,而且他们经常发起义演或义卖的活动,将善款捐给起义军和拉坎顿丛林里的原住民社区,以解决他们的饮用水、食物、教育、医药等实际问题。

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在当今反全球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型网络媒体——国际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 Center,简称IMC)。恰帕斯独立媒体中心的信息以新闻报道和信息公告为主,它以一种民主、非盈利的运营方式加强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并与隶属于IMC的数百个地方独立媒体网站形成了强大的媒体网络。1999年11月,众多媒体活动家和记者聚集在美国西雅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媒体网站,集中搜集和发布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前数年时间里都在致力于创造一个独立的媒体平台,西雅图独立媒体的建立无疑是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在当时,这个全新的左翼网络媒体力量好似一个新闻信息交易所,其上的新闻报道、新闻图片及影音资源每分钟都在更新,并且没有严格的版权限制。这个迸发出来的火星立即呈现出燎原之势,仅仅在西雅图独立媒体成功建立并运作的第二年,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立媒体人和媒体活动家就纷纷行动了起来,先后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网站,恰帕斯独立媒体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萨帕提斯塔运动与IMC建立联系也并非偶然,事实上,马科斯早在IMC成立之前就有过类似的呼吁:“当代主流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一个由VIP——达官贵人们组成的世界,比如那些大牌影视明星和政界名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是否要结婚,是否离了婚,参加晚宴的时候会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对他们来说已经过时。当普通人在媒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要么是杀了人,要么就是被别人杀了,要么就是坐了牢,或者上了法庭。……然而,我们还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就是创建一个新型传播方式以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带着国际性的批判性的眼光,展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真

实发生的故事。这种独立性媒体的工作,也包括挖掘每一个社会斗争的历史原因,并让这些真实的历史保存下来,而不会受到国家、地区、民族、社会利益团体、媒体寡头们的限制。在1996年8月,我们呼吁一个独立媒体网络的建设,一个独立信息网络中心的建设。我所指的这个网络中心是对主流社会所散播的谎言的抵抗,它不仅是社会运动的工具,更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这应是一个有关人性与生存的计划,因为传播或了解批判性的真实信息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①独立媒体与主流媒体的界线是非常清晰的,前者在内容上担负起建立文化多样性的责任并拒绝任何形式上的歧视与不公,在组织上恪守平等、自由、非盈利的原则,“独立”能够令它传达更具颠覆性的内容,而“草根性”则令其摆脱了权力与资本的束缚。譬如,统治当局可以轻易地控制国有电视台和官方背景的报纸,却无法彻底阻止独立媒体人撰写的文章或录制的视频短片在互联网上的传播。

当今的新型社会运动和社会抗议几乎都体现着向国际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很清楚,他们是在和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愿望的人们并肩战斗。他们的诉求各有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全球化。阿吉雷·罗哈斯试图结合世界体系理论来理解新萨帕提斯塔运动的意义,他认为只有将萨帕提斯塔运动放在世界体系中,以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角度去分析,才能抓住该运动深刻的本质和意义^②。萨帕提斯塔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跨运动”和“跨国界”特点的国际性反制度运动:恰帕斯印第安原住民这样一个特定的边缘群体通过其代言人副司令马科斯的个人影响力和高效的跨文化传播和媒介传播策略,将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的抗议内容和形式扩散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有效地动员并团结其它边缘群体发出共同的抗议之声。副司令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并极具震慑力的表白:“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圣伊斯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圣思多罗的奇卡诺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里斯托堡大街上的玛雅印第安人,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普赛人,魁北克的莫西干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夜晚十点地铁里的单身女人,无地农民,贫民窟中的帮派分子,失业工人,不快乐的学生,当然了,还有群山里的萨帕提斯塔……总而言之,马科斯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是那些被排斥的、被压迫的、被剥削的、高喊‘受够了’的少数群体。”^③随着该运动的进行与高潮的不断涌现,萨帕提斯塔民族解放军俨然成为了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边缘群体代表。

该运动已经从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认同问题变成了全世界边缘人群的社会、文化认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相同处境的广大共同体,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取得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认同。在马科斯眼里,萨帕提斯塔运动所直指的并不只是墨西哥主流社会和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问题,而是所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问题,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问题,主流社会和边缘群体之间的问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问题,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和参与的革命,全世界的弱势个体和弱势群体都站在了一起。马科斯在呼吁人们学会倾听,学会团结,学会打破沉默;马科斯在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希望他们能注意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可能存在着的强大不公,也希望他们能够紧握知识和词语的武器参与人类正义的战斗;马科斯在呼吁一个国际性公共领域的建立,希望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媒体能够搭起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马科斯在呼吁底层人民和弱势文化群体学会发出声音,以同一个拒绝来建立另一个世界,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来获得社会及文化认同感,携手走出不同的边缘困境。将关注点放在“星系之间”(intergalactic)的萨帕提斯塔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树立榜样的运动。当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徘徊在社会边缘的人们蒙上自己的面庞、对着镜头高喊“我们也是萨帕提斯塔”的时候,这场革命就已经走向通往胜利的光明大道了。

①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On Independent Media," *Our Word is Our Weapon—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Juana Ponce de Le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pp. 180~181.

②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185页。

③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Shadows of Tender F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pp. 214~215.

三、结 论

从墨西哥萨帕提斯塔运动的爆发原因、社会及文化背景以及该运动的新型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我们可以结合更深层面上的跨文化传播文化伦理建构的问题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一) 异质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存在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必然,随着冲突与斗争的加剧,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伦理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 在媒体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力量的过程中,新左派也走进了大众媒体的报道日程。然而,我们在努力寻找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方法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积极性,这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途径。

(三)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到来,既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手段,同时也为低位文化体系向高位文化体系的顽强抵抗和多元展示打开了便捷而有效的通道。然而,包括边缘文化群体在内的低位文化体系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四) 由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隔膜,加上低位文化体系因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不足而导致的边缘化状态,中介角色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这在墨西哥萨帕提斯塔解放军的后现代符号学革命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五)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无论是运用最古典的传播工具或形式,还是运用最现代化的各类媒体及商业化炒作手段,其表达和操作的高度艺术性与创造性对于文化交流和冲突中的弱势一方而言,是尤为重要的。

(六) 人类应该通过自己富于创造性的理性行为,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管理。

(七) 在充满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中,总是有一些东西能够引起不同文化中人的关心、共鸣和瞩目,从而成为对话、沟通、理解和支持的基础。比如对不同文化的神往、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对平等对话的诉求、对文化主体的尊重,对贫穷落后的同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还有对死亡的排斥、对勇敢的关注、对睿智的欣赏、对正义的渴望等等,这让我们有一定的理由对跨文化传播的良好前景抱有若干的信心和希望。

● 作者简介:刘学蔚,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车 英

